



日本的宫崎滔天在《二六新报》就慷慨激昂地说：“你如果生在中国，你也会参加义和团去和八国联军拼个你死我活吧？”

是义和团。因为我也主张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家。”

义和团尽管有各种问题，在当时，确实是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的一种意志的体现。日本的宫崎滔天在《二六新报》就慷慨激昂地说：“你如果生在中国，你也会参加义和团去和八国联军拼个你死我活吧？”

甚至曾被义和团围困在使馆区的曾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也对义和团有所同情。赫德说：“军事示威能持续到全部现有以及可能出现的团民都被斩尽杀绝为止吗？但是怎么能把中国的四亿人民消灭光呢？……两千万或两千万以上的人武装起来，经过操练，受过训练而且又受爱国的——即使是被误解了——动机所激励的团民，将使外国人不可能再在中国住下去，将从外国人那里收回从中国取去的每一样东西。”

1901年3月2日星期六，英国《图片报》发表了《在清朝抢掠》的文章和图片，文章写道：

“近期，对攻占北京时发生的抢劫事件的报道铺天盖地。毫无争议的是，这种大规模的掠夺行为获得了联军上层的允许，不过关于这一行为是否站得住脚的问题已经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最近，一大批掠夺所得的财宝刚刚运抵马赛，就被法国政府迅速送回清朝。《生活画报》的卢西安·勒罗伊最近刚从北京回来。他带来的照片显示，联军一进北京，就开始掠夺珍宝。有趣的是，这位法国记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首先必须指出的是，他在批评中并未宽恕自己的同胞。他主要介绍了联军对太庙的掠夺。他在文章中指出，传教士和清朝基督徒都参与到了劫掠之中。在他的一张照片中，一位传教士雇了一些当地男孩——他的学生——搬运一大包战利品，它们是弗雷将军运往法国的70辆马车战利品中的一部分。勒罗伊先生毫不犹豫地，掠夺似乎是联军的首要目标。他把这次远征比作1839年和1860年的远征。在1860年的远征中，英法联军将圆明园洗劫一空。樊国良主教最近也从北京回来。针对进入普通百姓家抢掠这一问题，他坚决地为自己在清朝的教友辩护，并宣称，如果一些基督徒在他不知情或者违背主教命令的情况下，以任何方式抢掠

了清朝家庭的财产，他将会做出必要的补偿。”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将北京城分成几个部分，由各国分别进行管理。涉嫌参与义和团运动的“囚犯”则被带到军事法庭受审。

在北京一条拥挤的大街上，士兵和水手自娱自乐。通向内城南门的路，一直是北京最拥挤的道路之一。街上的商人、赶驴的孩子、驼队、人力车和川流不息的北京推车，像英国伦敦河岸街上的公共汽车一样，一辆接一辆地挤来挤去，日复一日。联军士兵和水手最喜欢的娱乐活动是骑驴。他们身穿各式各样色彩鲜明的东方或西方制服，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色，但也加剧了交通的拥挤。

“1900年10月26日，和平谈判开始了。李鸿章旁边坐着庆亲王。”意大利人马达罗在《1900年的北京》中写道，“因为西班牙大使葛络干是使团长，谈判在西班牙使馆举行。会议十分冗长，令人疲惫不堪，谁都不愿丢面子，但中国人必须为和平付出高昂的代价。”

1901年9月7日，《最后议定书》（即《辛丑条约》）正式签订。《辛丑条约》中所涉及的赔款，因1900年是庚子年，所以叫庚子赔款。赔款按中国当时人口计算，每人一两，共计4.5亿两。日本人明水在《日人论中国整理财政政策》中说：“直到甲午战前，清政府的年财政收入大体都稳定在8000万两左右。但到1903年，岁入已达10492万两；到1908年，岁入达23480万两。”

1901年2月3日，瓦德西在“论瓜分中国事”中预言：“倘若中国方面将来产生一位聪明而有魄力之人物为其君主，更能利用世界各国贡献与彼之近代文化方法，则余相信中国前途，尚有无穷希望。”6月22日，他再次写到：“假如天为中国降一有力领袖，其人既能根本铲除一般上流阶级腐败情形，又能利用西方之文明，则中国前途正是未可限量。”

签订《辛丑条约》的1901年的中国虽然跌入谷底，但中国人民的觉醒也走上了历史时刻，西方列强面对觉醒的东方雄狮，他们侵略岁月的丧钟也开始敲响——一个新的时代正在拉开帷幕。■